家庭教育指导师“交钱就能拿证”？

全国政协委员呼吁：严把“入口关”和“出口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华锡

“我国今后几年至少需要460万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年收入可达10万-50万元”“没有学历门槛”“可推荐工作”……随着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以及家庭教育指导需求的不断升温，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师市场乱象频出，不少培训广告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还有的进行非专业家教辅导，甚至违背“双减”政策，出现了变相补课行为。

对此，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机构资质认定，建立白名单和黑名单制度，同时发挥政府、社会的主导作用，规范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注意到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的宣传广告，“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现在各类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证书可以说是满天飞了”。

胡卫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号称“权威部门认证”或各类行业协会、学会颁发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就有10多种，而各类培训机构自行颁发的培训证书更是不计其数。一些培训机构还推出所谓“速成班”或“纯线上班”，几乎交钱即可拿证。“总之，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市场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胡卫发现，一些培训机构过度营销造成新的社会焦虑。有的机构将家庭教育指导师渲染为缺口巨大的“高薪金饭碗”，推销各类“高价班”攫取暴利；有的机构则刻意歪曲立法本意，宣称家长须“持证上岗”，向家长兜售各类家庭教育指导培训。

“还有的家庭教育指导异化成了学科‘私教护身符’。”胡卫认为，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落实和推进，在学科类培训机构减少的同时，一些“私人教师”改头换面，以“家庭教育指导”之名继续行学科补习之实。

胡卫认为，这种直接面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乃至变相补课的行为，既不符合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定义，也违反了“双减”政策的相关规定，对“双减”实施成效产生了对冲。

“家庭教育指导培训市场问题初露端倪，如不尽早加以规范，将背离家庭教育的立法初衷，成为新的逐利产业。”胡卫说。

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一直在关注家庭教育。他认为，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施行后，在一定程度上带火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朱永新说，在中国高校开设家庭教育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的高校较少，中国的家庭教育专家队伍资源非常有限，在教学一线中成长起来的真正优秀家庭教育专家资源尤为稀缺。

面对鱼龙混杂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市场，他建议，要制定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规范，对培训机构的资质、教学质量、课程内容、专家背景，进行严格审查和认定，建立培训机构白名单和黑名单制度。

胡卫认为，要发挥政府、社会的主导作用，规范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市场。他建议，要强化政府主渠道作用，发挥家庭教育指导“正规军”和“主力军”的作用，切实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同时要牵头整合各种学校和社区资源，做大做强各类“家长学校”。

胡卫说，要秉持社会公益性原则，大力整治家庭教育指导培训行为。结合“双减”工作的推进，适时将家庭教育指导培训机构的设立列为行政许可项目，明确归口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切实强化对家庭教育指导培训机构的监管工作，重点打击各类无证经营、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和变异学科培训等行为。

胡卫建议，民政部门要督促相关行业协会、学会加强行业自律自查，不得参与举办营利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同时严把培训资质的“入口关”和培训质量的“出口关”。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代表委员议国是

3月3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实验幼儿园，小朋友在感受音量对听力产生的影响。当日是全国爱耳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爱耳日主题活动，宣传爱耳护耳知识，增强人们的爱耳护耳意识。
胡攀学/摄 （新华社发）

这群年轻人为何沦为电信诈骗帮凶

通过同学介绍加入 为消费享受铤而走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通讯员 甘 贤 吕昕冉

“是他（杨某）跟我说，你有人就介绍点过来，我这边真的需要人。然后我就安排了我的大学同学过去。”直到被警方抓获，21岁的在校大学生覃某仍抱着侥幸心理，对警方提出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极力将犯罪行为推到其他人身上。

2月20日，南宁铁路警方宣布侦破公安部铁路公安局2022年1号专案，打掉了一个平均年龄仅有20岁、帮助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金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涉案金额达540余万元。

2021年12月14日，南宁东站派出所接到市民何女士报案称，自己被电信诈骗27万余元。南宁铁路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通过梳理40个涉案账户发现，其中两个账户（潘某、王某持有账户）十分异常，有帮助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金的重大嫌疑。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一个以覃某（男，21岁，广西籍）、杨某（男，20岁，广东籍）为首，在广东、贵州等省份非法租用“银行卡4件套”，专门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平均年龄仅有20岁，通过同学之间相互介绍参与其中。”专案组成员曹哲健介绍。

去年12月30日，犯罪嫌疑人潘某在贵州省贵阳市落网。2022年1月13-14日，犯罪嫌疑人覃某、杨某、吴某等8人在广东省英德市、佛山市相继落网。

办案民警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月13日，专案组在英德市一个小区的出租房内对覃某实施抓捕时，这个21岁的在校大学生和5个大学同租室友正在睡觉。专案组成员敲门进入并表明身份时，覃某神情淡定，还将犯罪行为推卸到杨某身上。在同一小区的另一间出租屋内，面对警方，20岁的杨某也作出了同样反应，试图将犯罪行为推卸到覃某身上。

经查，杨某是该犯罪团伙的发起人，覃某是其高中校友，被杨某劝说后加入其中。覃某又将大学同班同学潘某介绍进入该团伙。其他成员也是通过同学、校友之间相互介绍加入该团伙。

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刑警支队民警刘茂东介绍说，在这个洗钱团伙中，杨某主要负责使用国外聊天软件与境外诈骗团伙对接洗钱业务。他们通过非法出借、租用本人及他人名下的银行账户、U盾、网银、微信、支付宝及电话卡，帮助网络犯罪团伙进行资金转移，也就是俗称的“洗钱”，从中赚取费用。

“我知道违法了，但那时候我特别缺钱，脑子也没有转过弯。”谈到作案动机时，覃某说。

2021年3月，在覃某的介绍下，同班同学潘某加入该团伙，主要负责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等，供覃某和杨某使用。警方审讯时，潘某供述称自己成长在单亲家庭，母亲是某超市收银员，家庭经济较为困难。

“母亲生活艰辛，但潘某使用的是某国外名牌的最新款手机，价值不菲。”专案组成员曹哲健介绍，这些涉案青年多为初入社会人员，受到不良消费观念影响，追求名牌、爱慕虚荣，在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此外，他们误入歧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朋友圈、社交圈混乱，自身立场不坚定，容易被眼前利益蒙蔽，同时抱着侥幸心理，被抓后才后悔莫及。

扫一扫 看视频

全国政协委员钟茂初：

通过财税举措实施生育友好型普惠政策

本报天津3月3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胡春艳）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提出，目前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发放育儿补贴金、延长生育假等鼓励生育政策，但同时存在“政策部门请客，用人单位买单”，加重企事业单位用人成本，对此他建议通过财税举措实施生育友好型普惠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国务院相关文件也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推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支持政策，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钟茂初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挤占社会保障资源用于奖励生育，将普通民众的社会保障权益作为资源，让生育子女家庭处于优先位；只对生育阶段进行补助，缺乏对养育、教育阶段的长期补助。此外，目前各地政策不一，没有体现全国一致的普惠性生育政策。

他提出，政策部门应着重解决生育支持政策的非普惠性（只有少部分人群能够实际享受到政策实惠）；出台对用人单位的激励政策，解决生育支持政策加重用人单位负担问题；关注一体化减轻生育、养育、教育各阶段的家庭负担。

钟茂初说，要基于“降低抚养成本是提高生育率的根本有效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认知，通过财税举措实施生育友好型政策。

他建议实施普惠性的个人所得税调节政策。对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收入超过起征点的，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则实行“负税收”政策，向其发放相应的生育补助金。为对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的成本进行合理扣除或补助。

钟茂初认为，这一政策符合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属性。将各地试行的生育奖励，统一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便于全国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可避免各地因财政差异、城乡差异、户籍差异而形成的差别化政策。发放到18岁，可涵盖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每孩每月1000元左右的补助金，相比计划生育时期的独生子女费，按可比价格、收入水平对比，这一补助金额度并不高；“从中短期来看，生育补贴带来的消费效应可以弥补这一财政支出；从中长期来看，人口红利远超这一财政支出。”

在实施减轻企事业用人单位生育相关负担的财税政策方面，他建议对于聘用生育期、养育期女性员工的企业，应实施税收优惠。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应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最大可能地降低企业相关负担。在女性孕育、生育、哺育的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缴纳（无论是否被雇用，均计算工龄），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为平衡人口生育、劳动力育成成本与人口红利的不对等问题，建议国家财政部门通过一定的政策机制，进行人口生育、劳动力育成方面的转移支付，即人口净流入、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向净流出地区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

针对高学历群体婚育年龄偏大问题，他建议对在学期间生育的女性研究生，学习期限延长1-2年，国家财政承担相应费用和待遇。此政策可先行在女性博士研究生中试行，取得一定成效后，可进一步扩展到全部研究生群体。

中国空间站今年将全面建成

首次实现6名航天员同时在轨

本报北京3月3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邱晨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光学舱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昨天透露，2022年，我国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将完成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神舟载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等6次重大任务，全面建成空间站，实现首次6个航天器组合体飞行，首次航天员驻留达到6个月，首次两个乘组6名航天员同时在轨。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2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立项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中的载人飞船系统、货运飞船系统、空间实验室系统、空间站系统、光学舱系统均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空间站任务规划包括关键技术验证、建造和运营3个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忠阳说，2021年我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基本完成，5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开展。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首次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方式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完成舱外航天服、航天员消耗品运输。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实现空间站首批航天员乘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进驻并安全返回。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完成后续航天员乘组物资运输。神舟十三号实现首次载人飞船径向交会对接，空间站第二批航天员乘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进驻，开展为期6个月的长期驻留。

“预计今年4月，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驻留6个月返回，之后，我国将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结果满足要求后，转入建造阶段。”张柏楠告诉记者，在建造阶段，我国将依次发射天舟四号、神舟十四号、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和神舟十五号6个航天器，在有人状态下完成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与核心舱的交会对接、转位，最终完成T字构型空间站的建造；建造完成后，对功能性能进行在轨测试，然后转入运营阶段。

他还透露，2022年载人飞船将按计划执行返回、两船次交会对接、三船次应急救援待命，涉及神舟十三号至神舟十六号共4艘神舟飞船。同时，还将并行开展神舟十七号、神舟十八号地面研制工作。

3月3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进行舞龙表演。农历二月初二到来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迎接“二月二”。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上接1版）这条建议的提出者正是焦新安。

“群众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对于焦新安来说，寻找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就是倾听广大师生及家长的心声，了解他们的期盼。在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焦新安了解到，毕业生找工作期间经常反复体检，且体检结果各单位间互不承认，由此他萌生了倡言建立毕业生就业体检档案共享机制的想法，并在广泛调研与论证后于2021年全国两会正式提交建议，得到毕业生的热烈响应。

这并不是焦新安第一次关注高校毕业生群体。2020年，他建议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服务国家标准，实现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2021年，他建议加快建立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支持体系，避免标签化、提升公平性。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应当不断创新就业创业工作形式，不断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核心竞争力，努力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焦新安说，2018年，扬州大学对标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规范》，编制并实施了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通过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高校，形成了高校就业创业工作的扬大方案。这一规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对推动毕业生“云端”就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关注毕业生就业，焦新安代表还十分关心学生健康。去年两会，他建议系统构建大中小学健康教育体系，一体化实施大中小学健康教育，让健康教育伴随学生成长全过程。

今年，焦新安带着有关地方高校培养“一懂两爱”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多个建议再次参会。

“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牢记人民群众的冷暖关切、所需所求，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真正达到建议一件、推动一件、解决一片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把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落到实处。”焦新安说。

广谋良策、广聚共识为青年就业护航

（上接1版）其中，对高校毕业生，要拓宽就业渠道，同时合理引导预期，帮助他们实现市场化、社会化就业。

“解决就业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包括准备就业的年轻人的共同努力。”郭卫民呼吁，希望中青报和其他媒体积极开展工作，进行宣传报道。“我们相信，只要各方共同努力，稳就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不只在就业方面，在回答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外贸挑战等相关问题时，郭卫民多次提到年轻人。

“他们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我相信中国的外贸事业会像这些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未来可期。”他特别提到参加全国政协外事委组织的调研时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陪同调研，介绍、回答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与新冠共存”，中国应对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否会调整？在回答美国彭博社记者提问时，郭卫民说，我国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郭卫民解释，面对一些发达国家疫情接连出现反复，医疗资源被挤兑，重症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的情况，中国作为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果难以想象。”

郭卫民说，政协委员们认为，疫情防控成果证明，我国的防疫政策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规律，防疫措施相对成本低、成效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将加强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努力以更高水平、更小社会成本控制住疫情，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发布会上，中美在民主话题上的交锋备受瞩目。当被问及中美是否在争夺民主话语权时，郭卫民回应说，美国在自身国内问题矛盾重重、美式民主饱受诟病的情况下召开所谓民主峰会，“无非是为了拉帮结伙、打压他人、分裂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

“有的西方国家社会治理乱象丛生，连本国人民也越来越不满，却试图把自己所谓的民主模式通过‘颜色革命’等强加给别国，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他表示，民主的样式是多元的，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各国的民主制度应该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来自主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从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到设立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政协近年来不断创新协商形式，提升政协协商民主效能。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郭卫民说。

中国经济走势是舆论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郭卫民介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同时要看到，今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委员们认为，今年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作的部署落实到位，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郭卫民说，有委员建议，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有效拓展国内需求，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要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技术创新，包括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要十分注重各种政策出台的统筹和解读，及时研判风险，化解公众疑虑，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都认为，我们有信心、有条件，也有能力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郭卫民说。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时代出卷 青年答卷

（上接1版）

群众的诉求、社区工作站里无数个日夜、与文化和教育相关的日常工作和老代表的叮嘱，都成为她的底气。为了调研关于宫颈癌疫苗的建议，徐萍数次求教资深的医疗专家。有一次，专家和她聊起想培养群众防拐卖意识，面对面的培训虽然传统，但可能非常有效。

这位从小在四川广元青春县农村长大的姑娘突然意识到，农村外出务工妇女来到城市陌生的环境，或许这样的培训，是让她们提前预知和学习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

徐萍刚当上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年，也是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开局之年。支边青年、驻村书记、返乡村官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完成改变千千万中国人命运的伟大决战。那一年，90后全国人大代表也成了一抹亮丽的青春风景线。返乡大学生村官、农民工、医务人员、技术工人等各行各业的青年扛起时代担当，代表青年发声。

如今，31岁的袁海波已经走上管理岗位，早已不再是那个19岁的打工少年。但在他身上，有些东西始终没变：之前的手机号码一直使用着，他依然在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群聊里活跃着，周末一有空他就组织农民工聚会，听大家报喜谈忧。

5年间，国家发生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改变：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青年接力奋斗的新议题；“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十四五”规划大幕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可以触摸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这些改变，袁海波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履职这5年，农民工群体“整体都有很大的变化”：“过年返乡的摩托车大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汽车大军，过年时大家相约开车回来，过完年又开着车去打工。”

5年来，袁海波的关注点从最初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到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再到如今的技能培训。“从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工作，到提升自我。”袁海波说，农民工也不再满足于“有活儿干”，还要向焊工、叉车工等技能型岗位靠拢。“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90后农民工，明显愿意多学习，只不过信息的获取上可能还不够及时全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这正是袁海波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持续努力的方向。

为了给农民工提供更多学习计划，让他们早上手、早挣钱、早稳定，今年袁海波建议多部门联动，利用农民工返乡的时间点，由户籍地组织技能培训，让他们离乡也能满载新技能出发。

建议的升级推动了群体的转变，也见证了国家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2019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开始执行；2021年8月，《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出台……

“我们离国家越来越近了。”袁海波感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袁海波在下乡宣传劳动力转移的路上，用手机看了冬奥会开幕式。他对中国代表团的出场环节印象深刻，“心里充满油然而生的自豪，真的觉得我们强起来了。”

履职5年来，90后这个标签已经不再是这群全国人大代表唯一的受关注点，大家更关注他们的建议是否知民意、懂民心。

他们来自青年，关注青年，为青年发声，但又不只是青年。出生于1990年的杨昌芹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承人。她创办企业，带动村里留守的妇女、老人、残疾人就业。为了让更多人守护“银发一族”，李楠楠放弃大医院的就业机会，投身老年护理产业的。女排运动员朱婷、张常宁，游泳运动员叶诗文、闫子贝，将对运动的热爱和理解延伸到赛场外，致力于让更多国人拥有强健体魄。大学生村官、湖北大市村村支书程桔，把青春留在祖国边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镇党委副书记崔久秀，汽车喷漆世界冠军杨金龙，砌墙砌出世界级水准的邹彬等，90后全国人大代表用青春建设祖国，用他们年轻、开放、极具活力的视野，为各行各业、各族各地的人民发声。

接受采访时，袁海波即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袁海波说：“90后是恰逢国家盛世的一代，我们应担起身上的责任，只争朝夕，加倍努力，做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前不久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中国冬奥健儿竭尽全力拼搏奋斗的模样，给徐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隔着屏幕感受到千里之外的同胞带来的这份对祖国的骄傲和自豪。当高铁开到老家青川，当她工作生活的成都成了突破两千万人口的蓬勃都市，徐萍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汶川大地震曾给她的生活以重创，但是在同样远隔千里的浙江同胞的帮助下，在结对子家庭的叔叔阿姨的关怀下，她得以走出乡村，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帮助其他人。这一刻，徐萍心中的温暖与感恩，都交汇在了一起。

“我有多大能力，就会使多大的劲儿。”一个年轻的声音坚定地说，“无论是5年前还是现在，当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时，这份激动从未变过。”